

編後語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的教育取得了飛速的發展，但是距離民眾、社會與國家的預期依然有相當大的距離。人人在議論教育，人人在批判教育，人人在呼籲教育改革。耐人尋味的是，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引發海內外學界眾議「中國發展模式」的情形有所不同，中國教育的飛速發展並沒有激起有關「中國教育發展模式」的熱議。相反，眾多中國的有識之士已經深切地認識到，在整個教育體系中，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瀰漫着行政化的癌細胞。正如中國很多社會經濟領域發生的事情一樣，當今中國教育領域呈現「偽市場化」的特徵，實際上是一種「行政主導型的商業化」。政府一方面維持原有公共教育資源配置的主導性，另一方面又允許公立教育機構走向商業化。於是，處於優勢甚至壟斷地位的公立教育機構一隻眼睛向上，對政府的資源全力爭取；另一隻眼睛斜視，對來自市場和社會的收入絕不放過。中國的教育體制的確存在着嚴重的不公平、大一統、品質低等眾多弊端，家長、學生和教師們都陷於囚徒困境而苦不堪言，「德、智、體、群、美」無一着落。

本期的「二十一世紀評論」專欄刊載了四篇文章，從不同的視角檢視中國高等教育的弊端。張鳴概述了中國大學在行政型壟斷公司之路的快速墮落之象，指出唯有向私立和教會大學開放，中國的高等教育才有再生之望。熊丙奇以取消高校行政級別為核心，分析了中國大學「去行政化」遭遇的重重阻力，冀望教育部以其直屬高校作為試點，率先推動去行政化改革。毫無疑問，落實這一改革思路的難度，恐怕同與虎謀皮相似。王則柯提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可以首先從去意識形態化入手，即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不再成為大學的必修課。儘管這類課程遭到大學生的普遍唾棄（我刊2009年12月號曾有實證性文章給出了有關的證據），但是它們卻是中國意識形態灌輸體系中所有從業人員的飯碗，打破這一飯碗的成本恐怕堪比與狼謀皮。劉超以日本大學為核心，討論了多國大學體制的優劣得失，提及了大學與國家的關係對於各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影響和制約。

本期還有眾多有意思的文章。「百年中國」欄目三篇文章的主題各異，但都從不同的角度論述了抗戰和內戰時期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韓君對深圳和香港政府公共預算的透明性進行了比較，揭示出不同政治體制下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不同呈現方式。任軍鋒對傅高義的訪談，啟發我們思考中國在學習東亞「發展型國家」的道路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複雜性。周永明力主開闢的「路學」新學科，將修建道路這一國家行動放在地方性人文生態多樣性的廣闊視野中加以考察。李琮敏對余華小說的評論，展示了一位韓國學者對中國國家—資本組合導致社會衰敗的深切體認。